

關於工作作風問題

關於學習問題

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關於工作作風問題

時時刻刻

爲老百姓興利除弊

劉子久

高崗

高崗

新浙東報社編輯
浙東報社發行

關於學習問題

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劉子久

解放日報發表劉子久同志「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按這封信的作者劉子久同志，內戰時期任河南省委書記，抗戰時期曾任淮北區黨委書記，現仍爲淮北抗日根據地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四個月前來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這封信，照作者原意是委託人帶去的，當他交給中央同志閱看時，中央同志認爲可以並且應該在黨的機關報上公開發表，並委託新華通訊社廣播淮北及各地，使各地各級領導機關中的同志以及廣大黨內外羣衆均能閱讀。因爲劉子久同志在他的信裏，代表廣大黨內黨外羣衆說出了心裏想說的話，而他指出的弊病，作爲現象的一種，或一個側面，在我們黨裏，在各個抗日根據地裏，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幾年的整風運動中，這些弊病是在逐漸被克服中。但是還沒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整風還未深入，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給自滿，自高自大，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的風氣，並沒有很好的受到批評；認真關心羣衆利益，認真發揚黨內外的民主，認真向廣大羣衆中與各個階層中的模範人物學習，發揚這些模範人物的事蹟，當作推動全般工作的範例，這種作風，還沒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還須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們曾發表蘇聯作家的劇本「前綫」與郭沫若先生的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並印成小冊，發給同志們閱讀，目的都是幫助同志們整風，使我們黨內的不良作風早日得到消除，正確作風早日得到普及。現在又將劉子久同志的信發表，並將印成小冊廣送同志閱讀，同樣是爲着這個目的。

——解放日報編者——

我到中央黨校學習已經是四個多月，這是我入黨以來第一次。學習方法是用反省的方式，去聯繫實際，去檢討過去自己及黨的各種政策與工作。在反省的過程中，特別著重在思想方面，求得把自己的思想擺通。現在就將我近來在學習中反省到的幾個問題寫給你們看一下。是否對，尚不敢十分自信。只是證明我近來在學習中所引起的思想上的變化，尚望予以批評指正。

從『走夏陶然的路』說起

夏陶然同志，這就是我們二十五團的一個偵察員，因身體不好，在前年實行簡政政策時，把他精簡下來之後，把他派到河南縣泰山區中澗村小學去當校長兼教員。這個小學，是早已被人家辦「滑了」了之意；主要的理由，就是由於這個村莊太窮，學生除書與他們家庭生活之難的矛盾（困難）不能解決，所以常常是有先生，無學生，毫無生氣；而過去的一些先生們，則給這個村子的羣衆加上了一頂「落後」，「不開通」的帽子，以掩飾其辦學的無能。夏陶然同志到了那裏之後，從他同學生及學生家長的親切談話中與自己的切身經驗中，很快就看出了這個矛盾，並想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方針與辦法。方針就是把學生的學習與生產結合起來；辦法就是把那二十個小學生，按照他們的家庭與本人的情況，採用自願的方式，編成了幾個小組，如：草小組、挖菜小組、編筐小組等。這樣實行集體與互助勞動的結果，學生除了學習之外，生產方面，比較他們在家裏幹活時的成績，還大得多。於是，在開學之後，曾被家長扣留在家里幫助幹活的學生，又送來了；有些本來就未去上學的小孩子，看到這種情形，其家長也要求把他們的小孩子，送到學校裏去。去跟夏老師學習。因此，學生的人數，就逐漸的多起來了，學校也活躍起來了。校舍壞了，夏陶然同志就親自領導學生下手修理。對學生的管理方式是：個別小孩子在學習與生產中不積極或好吵架的，他也不用自己去打罵的方式管教他，而是動員學生羣衆去批評他，勸告他，這樣一來，那些好頑皮的孩子，也老實起來，守規矩了。此外，夏陶然還利用了他那個老師的資格與地位，去爲學生的家中及村子裏的人排難解紛。他的文化程度多也不還是高小畢業生，可是他於中澗小學，不過一年的時間，就使得中澗附近，真是無不稱頌了。那箇小學裏學生們的家長，特別是那些小孩子們的母親，對於他們的夏老師的關心、愛護，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來。去年，陽曆八月間，二分區在前整一

崑山區區署所在地，離中澗有六七里。開辦暑期小學教員訓練班，夏陶然也在那裏受訓。一個多禮拜的工夫，學生及其家長，沒有見到他們的夏先生，小孩子的母親們很關心他，於是就湊了三四十個雞蛋、好幾斤鮮菜，打發了七八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乘着一隻小船，到館裏去看望他們夏老師。

當時正是淮水大漲，流急浪大，我也正在那裏作報告，看到這種情景，深為感動。早在這個訓練班之前，二分鐘召開的小學教育研究會中，在有小學教員的報告中，以夏陶然改造中澗小學的報告為最生動，最惹人注意。許多小學教員聽了這報告，都感到興奮與鼓舞，紛紛與夏陶然商榷。夏陶然說：「走夏陶然的路」，還請社論拿出來去審查時，我記得是在陳店子松樹林內的會議室中，由民兵會議時大家傳看的。有的同志就認為這是有關我們教育方針的大事，中央及軍中局都沒有這樣的指示，我們不能這樣輕率地提出問題，因而這篇文章，就未用原題原文與社論的形式發表。因之夏陶然的那套教學方法，當時也就未能被我們採用與發揚。當時潘琪、江陵等同志之所以這樣地提出了問題，恐怕也還不是由於他們真正在思想土完全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受了在解放日報上所發表的「吳滿有的方向」那篇文章的影響；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帶有一種樸素的直覺的性質，尚未能把它提高到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所以當時對這種意見紛歧的爭論，並不十分尖銳，然而「真理高於一切」，潘、江等同志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幹部與羣衆密切結合，一切為羣衆服務，從羣衆切身需要出發去解決問題這個天經地義的真理，所以他們才這樣提出了問題。

最近，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西北局、文協、教育廳以及毛主席在延安開學運動的講話，解放日報關於教育問題的社論中所提出的教育方針，與一些模範小學與模範教師的介紹文章，與夏陶然所作報告，竟不謀而合，這證明了解放日報所走的路，正是我們在教育方面應該走的一條正確道路。夏陶然就是我們江北教育界中與潘琪有與潘琪占。

關於「走夏陶然的路」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某種觀點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但以今天華風的眼光看來，則非同小可，不是簡單地創造天才的體現。而我們當時處理這件事的態度與態度，是反映了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辯證唯物論的革命性與創造性；是反映了我們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

不肯向羣衆學習；是反映了我們不大懂得「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問題。

我更進一步的回想一下，在我們那邊，像夏陶然一類的人物，還有不少，如挖河工人中的周大華，災民中的李子老滿（見三月二十日解放日報段佩的通訊），臨淮頭山東幫的歸救主任（名字我記不清，林丁同志曉得）其他如擲軍英雄、民兵英雄、模範戰士等等，如果我們真的仔細的去檢查一下，還可發現許多。這種羣衆中的天才，輩人，狀元、領袖、諸葛亮，本來就有，在我們今天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土壤，就更容易發生滋長。像吳滿有、趙占魁等新型的英雄人物，我想決不會只在陝甘甯邊區能出，其他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都同樣的能出，只是因為我們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有毛病，未被我們所發現，黨與政府及軍政內部的官僚主義，把他們壓住了；即偶而被發現，也未被我們所重視，而予以應有的發揚光大，夏陶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我們某些時候的某種情況。吳滿有、趙占魁等人，遇到了毛主席高崗同志等這些伯樂，就成了轟動一時、名傳千古的英雄人物，其他與吳、趙一樣的人物，假如沒有遇到一個伯樂，就湮沒無聞，與草木同朽了！但是我們是最進步階級與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應該一變歷史上的狀況，就是說，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馬而且有很多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

這種從發現與發揚各種各樣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着手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不惟是推動與開展各種工作的一把鑰匙、一個樞紐，而且是一種發現與提拔新幹部最好最重要的方式。經過這種方式所發現與提拔的新幹部，其本身就具備着聯系羣衆及工作中的創造性兩個基本條件。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也比較用別的方式所發現與提拔者為大。而且提拔他們之後，別的幹部也不能不服氣，去說怪話。因此，我希望我們能够從上面這一個小小的具體的現實的例子中，得到一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啓示，并以此去教育與鼓勵我們的幹部、黨員與羣衆，到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一定會引起一個很大的轉變與進步的。不知你們以為如何？

但我並不是說，夏陶然這個人就是十全十美，毫無缺點，他所採用的教育方針與辦法，也已經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東頭。相反的，恐怕他自己也還是剛摸索出來的這一套辦法，還未自覺的把它提高到理論的思維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在他還是帶有一種摸索的性質，還處於一種萌芽狀態。但這一切不可避免

的缺點與毛病，並無損於他這件事情之有偉大的意義。而我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正是因為我們不瞭解這件「小事」的偉大意義，而加以發揚光大，使之條理化、系統化，把它由不自覺的階段，提高到一種自覺的階段。而這樣做，正是我們的領導機關應有的與主要的任務。我現在的認識如此，不知你們以為然否？

二 正確的口號，錯誤的方法

我們很早而且不止一次的提出過創造模範村、鄉、連隊、支部的口號，並且訂出了具體的競賽、獎勵計劃。但據我所知，迄我離開江北時止，仍未能創造出一兩個真正稱得「模範」的村、鄉、連隊與支部，即使有時創造出了一個半個，也僅僅是熱鬧一時，不久便消沉了，而未能堅持下去。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第一，就是由於我們不懂得，或者忘記了一個最簡單、最顯明、最初步的道理，即無論作什麼事，都是由人去作，而且都是由小處近處開始。因此，我們要想創造模範村、鄉、連隊……就必須從創造一批模範人着手，如模範村長、鄉長與人民、模範的連長、指導員與戰士、模範的支書、支幹與黨員……吳有與吳家寶、劉玉厚與劉家橋、劉建章與南區合作社、夏陶然與中壩小學，都是實際的例證。沒有這樣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人物，自然不能創造出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事業，如模範村、鄉、連隊等。同時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是到處都有的，但是假若我們不去發現、表揚、提高、幫助這樣的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去推動一切的村鄉連隊與各色人物，並創造出更多這樣的模範。這就叫做相得益彰，互相發展。而起決定的推動作用的是模範人。過去我們是不懂得這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我們所用的方法常是倒行的，是從主觀的鎮統地去創造模範村、鄉、連隊……開始，而不是從原有村、鄉、連隊中去發現模範人開始，這是不合乎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也就是主觀主義的。所以，我們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正確口號，由於我們在實際行動中的方法錯誤，結果就變成了不能兌現的空喊。

第二，為什麼有時我們也創造出了若干的模範事業，但是常常不能夠持久呢？這也是由於前面所說的那種錯誤的思想方法而來的。因為，我們既把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口號提得很高，而又沒有從發現原來模範人物的正確方法開始，爲了完成任務，就不能不使用外力，從別處彙集一批幹部送到那裏去進行突擊，

我們「自力更生」，也沒有在突擊過程中去打地基，一旦這種代客、包辦、「加油」、「打氣」的助力一去，就好像去了氣門塞的氣球一樣，很快地消失下去了。這是自然的道理。

最後，就是我們在提出創造什麼模範的口號與計劃時，往往是採用多頭並進、全綫出擊的方式。例如提出每縣創造一個模範區，每區創造一個模範鄉，每鄉創造一個模範村；：：沒有或者不會去運用「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集中力量，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進全盤」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所以我們也說常常是「貪多嚼不爛」，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三 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

我回想起來，我們在過去的工作當中，曾經有過不少好的東西。如幾年來宿東、蕭縣等地的鐵錫軍工作；前年冬季大「掃蕩」後，泗宿、淮泗等處的民兵工作；去年春季疏濬御溝河、梁河、安河等工程中某些勞動組織；去年夏天，在泗南、盱鳳嘉、泗五靈鳳等縣，曾經風行一時的「論戰大會」；第三、四等明輪訓練的寧鳳學習；淮北中學的反奸鬥爭；師直及各旅、團、營的反軍閥主義的鬥爭；：：這些東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從這些萌芽狀態東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對敵鬥爭、組織勞動、發展生產、整風、整幹等各種指導方針。各地並根據着這些方針，作出了許多輝煌成績。我們對於那些萌芽狀態的東西，未能追根究底的把它們鑽研一下，找出其發展規律，經驗教訓，使它們由感性的東西，上升為理性的東西，以便再回到實踐中去，推動我們的事業和繼續豐富我們的理論。我們沒有這樣做，因而使這些良好的萌芽，因為沒有得到我們適當的灌溉培養，也就未能滋長壯大，開花結實，而自生自滅，荒蕪結稿了。我認為這是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不能很快提高、進步太慢的主要原因。

同時，我們也會遇到許多困難，犯過許多錯誤，而這些困難與錯誤，也都因為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多半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與糾正。例如，我們有許多地方工廠幹部，因為積極參加工作，就誤了生產，其結果，他們的家庭經濟地位，有的不但沒有像一般羣衆那樣上升，反而日趨下降，弄得他們父母兄弟、老婆孩子，大不滿意，親戚朋友、鄉鄰故舊，都無好評。因此，他們對於工作，努力、愈積極，就愈覺困難。在泗南等地，曾經發現不少在黨認為是「積極」的幹部與黨員，羣衆中也大部對他

們（即說他們不好之意）。這些地方工農幹部，積極做工作，與他們自己及其家庭生活困難不能解決這一矛盾（這個問題，在陝北及其他某些地區，是提倡發展家庭生產中，已得到圓滿的解決），很早就被我們發現，這我離開北時為止，尚未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其他，如機關支部都擺不好，許多幹部感覺到工作中心太多，顧此失彼；黨政政策上「左右搖擺」，「朝令夕改」；幹部在工作中常常發生「疲勞」與「老一套」等問題，都是早已被我們感覺到的。只因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對這些複雜的現象，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問題也越搞越複雜，不能及時的糾正。因此，我們在工

報告，我們對於自己所作的各種工作，無論是成功的也好，失敗的也好，都難以追根究底的精神，以調查、研究、分析、綜合的方法，把它們鑽研一番，我想，一定能够找出個「所以」與「數眼」來，而這「所以」與「數眼」就會成為我們工作開展的「橋樑」與幹部進步的「酵母」。

四 我們怎樣去發揮幹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呢？

我們常常提出「幹部（一般黨員與羣衆也是一樣）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問題。但是，在我們黨內，卻不盡發現有所謂「疲勞」（不積極）與「老一套」（無創造性）的現象，其故安在呢？這其中原因很多，皆從我們的領導方面來檢討，我認為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的領導作风不够民主，工作方

平不聽聽人家說我們不民主，總不大以為然，覺得有點不大舒服，但果使自己反省一下，不民主的地方，就不但有，而且還不少呢！我現在就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們剛從豫皖蘇邊區轉移回皖東之後，所有地方工作幹部，都住在管鎮附近的黃莊一帶休息，當時，就想到用這個時機，檢討一下過去這一段的工作。開始有許多幹部都不肯講話（後來講話的是很多了），因之就叫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但他們寫出來之後，又都不肯署名，怕報復。結果，幹部到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意見書，變成了「匿名揭帖」與「不能名投票」。第二個，是同年夏天，在仁和茶會場上那場「風波」，主要的是過去領導作风不够民主的反面結果。第三個，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到花園進輪訓隊，去徵求那裏的幹部對於我們的意見。他們首先提出而且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負責同志們的意見是否能夠

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我想我們的幹部，像在整風輪訓隊這種場合，無顧忌的提出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意見，是他們應有的、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一種權利。可是，他們竟把這種每個黨員應有的權利，當做他們發言的一種前提條件來提出，是頗值得我們自己反省的。第四個，是同時的輪訓隊內，石立志同志（他與狄克東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冬季反「掃蕩」中，犯了錯誤，經過我們指出，他們已承認，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已開始緊決轉變之際，又被決定予以撤職處分的。）的反省筆記中寫着：他有些意見，很想找我談談，可是他有幾次走到我的門外，又折回去了，始終沒有進去談，結果還是悶在肚子裏回去了！（也是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這種例子，如果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下，還可以舉出許多來。倘若這種不民主的現象讓他繼續在黨內存在下去，而不迅速的加以克服，又怎樣能够像毛主席在論新階段中所說的，表現出我們的「領導機關、幹部、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活躍，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呢？怎樣能使這些幹部在工作中「提起勁來」，而不常常「鬱鬱不得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呢？

但是，他們對我們並不是沒有意見。其所以不肯披肝瀝膽，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就是怕說出來之後，上級常常不理會，或者還會因此出岔子，因此，他們就服膺那兩句「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緣強出頭」的格言，不肯去多嘴多舌，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們既有意見，而又沒有說出來，悶在肚子裏，終還有點不大舒服，就必然會發生「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會內不講，會外亂講」等自由主義的現象。因此，什麼「小廣播」、發牢騷、說怪話等歪風，也就常常當作對於領導方面不民主的一種懲罰而出現。我在中央黨校，看到許多過去好說怪話、發牢騷、不安心的幹部，自從毛主席及黨中央總召每個同志，在整風當中，「有話就說」之後，讓他們在黨的會議上，痛痛快快的發了幾次牢騷，他們就心平氣和，比以前規矩多了。這些幹部，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對黨是忠實的，對革命是有功績的，有些是由於領導上的不民主而造成的他們的不滿。若不用發揚民主的方式，使他們自己去把腦子裏那些好東西及壞東西一概倒出來，好的給發揚，坏的給洗乾淨，他們是難以接受別的好東西的，因為他們的腦子裏既然藏着那一部份（有時是很多）髒東西，就是勉強灌一點好的東西進去，也很快就被原來裏邊那些壞東西傳染了。沒有民主，則好的意見得不到承認。如果一個人腦子裏藏着很多髒東西，在沒有得到機會傾倒出來之前，他們是看不到他們自己有什麼缺點的。就好像在一個人未照鏡子之前，看不到自己的臉上有灰是一樣。

這樣，你說他臉上有灰（有錯誤），他會不相信（不接受批評），更不會自動的去洗臉（自我批評）。我們在去年的整風當中，也曾經不斷發生這類現象。不過未被我們認識到這是一種重要的思想領導法則，而把它加以發展與普遍運用罷了。

在發揚民主的條件下，一般幹部對於工作積極性的提高與創造性的發展，是有密切聯系與相互作用的。一個在工作中發揮了積極性的幹部，其創造性必大，同時一個在工作中被發揮了創造性的幹部，其積極性也必高，那是一定的。蘇聯的斯塔哈諾夫、陝北的吳滿有、趙占魁、晉察冀的李勇等人，就是這一方面的具體例證。因為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已經看到，他們不是專供別人驅使剝削的奴隸，而是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主人！而他們自己原有的不可避免的許多缺點（如狹仄等），也常在自己的奮鬥與發展中洗掉了。

在發揮幹部工作的創造性上，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工作方法的科學化。我這裏所要說的就是：「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這兩點，我們常常把工作中的創造性抽象化、神祕化了，認為還是那些天資聰穎、學問淵博、地位優越的少數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非一般人所能及。假若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我恐怕就有不少幹部答覆不出。這樣，你天天去喊叫發揮什麼創造性，豈不「見鬼」麼？

我認為我們所需要的創造性，並不是那些「奇技淫巧」與能「降妖捉怪」的東西，而是那些凡是能為羣衆與利除害、能幫助羣衆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能，戰勝敵人，解放剝削壓迫，推動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什麼發明與發現，不論是大小與多少，都是應當為我們所發揮並發揚的創造性。因此，瓦特的蒸汽機，馬克思的資本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固然是人類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創造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大發揚而特發揚。而吳滿有等人的「變工隊」、「扎工隊」、趙占魁的工作方法、工作態度與管理工廠辦法，劉建章的合作社經營辦法，以及夏陶然的教學方針方法等等，也同樣是應當被我們所發揮與發揚，有偉大創造性的東西。而這些歷史人物的創造性之產生，既不是神人傳授，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從那些具體的現實的極平常的客觀事物與環境出發，去不斷實踐、反覆研究而得的結果。瓦特的蒸汽機，是從一個開水壺蓋子被蒸汽衝擊而跳動開始研究而得到的結果；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研究眼前的一般商品開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從研究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與十月革命後的國際環境出發；吳滿有

等人的「變工隊」、「扎工隊」是從研究陝北這種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生產如何變為互助生產出發；趙占魁的工作方法與工廠管理辦法是從研究一個人數不多的手工工廠生產出發；劉建章的南區合作社經營辦法是從研究一個僅有一百六十名社員、一百五十九元九毛鈔票的股金的小小合作社開始；辜陶然的教學方針與辦法，也是從研究一個家庭窮得不能維持生活的小學生的中途小學出發。因此，凡是願意「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埋頭苦幹，深思熟慮，決心為羣衆服務，而又肯向羣衆學習者，不論是個人和集體，就必然有創造性，而且一定能够創造出一些造福社會的新東西出來，是可以斷言的。

因此，假若我們能够好好的發揚黨內黨外的民主作風，為黨內黨外的幹部與羣衆造成一種發揮他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環境，告訴他以「實事求是」、「打開腦筋」的分析的科學思想方法，再加上一種為羣衆服務向羣衆學習的羣衆觀點，則所有那些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幹部與羣衆，不用說一定會朝氣勃勃、日新月異，就是有些兩條心的份子，也會在這種「治病救人」的民主作風之下受到感動，在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前心服，引起他們自己的坦白與轉變的。在他們自己坦白轉變之後，也可以在工作中創造出一些新東西出來，有些並且是很有價值的。在延安已有很多的實例。這樣一來，所謂工作中的創造性，就不是某些少數個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更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羣衆性的東西，變成了一種羣衆運動。這樣一來，在我們幹部所常有的那些「疲塌」、厭倦、消沉、苦悶與「老一套」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的現象，也就不攻自破一掃而光了。

五 爲了誰？對誰負責？

假使向我們黨的幹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誰？都應當對誰負責？我相信有許多同志會這樣的回答，都是爲了黨與上級，都應當對黨與上級負責。這當然也是對的，既然是黨與上級交給他們這些任務，他們是應該向黨與上級負責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種回答，還不能滿意，因為還不完全對。假若再問一聲，整個黨的工作又都是爲了誰？又都應該對誰負責呢？我想恐怕就有些同志答不出來或者答覆得不適當。

我們的黨既是爲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謀解放的，那麼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並應當對他們負責，正是當然的。但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真理，在我們的同志中尚

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還沒有把它攪通，因之在實際工作中也就常常犯錯誤，儼然與自己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起來。

黨所領導的各種工作，不僅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植植樹，挖河築堤等等，完全是爲了羣衆，是羣衆自己的事；就是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等，也還是爲了羣衆，也是羣衆自己的事。但是因爲黨的利益與羣衆的利益應當完全一致的這一基本思想，在不少幹部當中，沒有把它弄通，於是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就常常不是眼睛向下，面向羣衆，爲了羣衆，對羣衆負責；而是眼睛向上，背向羣衆，單純的爲了上級與對上級負責。在他們心目中，是把黨和上級與羣衆對立起來，把對黨對上級負責與對羣衆負責對立起來。因此，就不僅在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工作中，常常發生強迫命令、命令、打、罵、關、罰等等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的現象，在酒席就會因爲徵收公糧發生過逼老百姓的事！就是在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植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當中，也不止一次的發生過強迫命令，以至打、罵、關、罰的事情，潤南就會有一個工作同志，因爲增加工資問題，打過一個雇工兩個耳光！這好樣是一件怪事，然而這卻是事實。

正因爲有些幹部，對於爲了誰？對誰負責？即黨與羣衆的關係及怎樣去領導羣衆這一個基本問題，在思想上沒有攪通，於是就不僅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事，在羣衆看來，都是爲了黨、政府、軍隊幹的，而不把這些看作羣衆自己的事，常常發生隱瞞謊報，違抗逃避的現象；就是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植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在有些羣衆看來，也好像是爲了那些工作同志，去完成上級所給予的任務，而不得不做的。因此，什麼「明減暗不減」，「明加暗不加」，拖延敷衍，應付「差事」的現象，也就都來了，這就叫做「事與願違」。

有些幹部，爲了有效的去完成黨與上級的任務，對黨與上級負責起見，有時就不惜對羣衆採用強迫命令，以至打罵威逼的方式。可是，在這些幹部犯了這種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的錯誤之後，爲了衛護黨與上級在羣衆中的影響與威信起見，就不能不給他們一種處分。這對於那少數乘機搗亂、「兩條心」的份子，固然是罪有應得，人心稱快；但對於那些真正是忠心耿耿，爲了黨與上級並對黨與上級負責的幹部，則是「兩頭不討好」，「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了。

我們的許多幹部，這種缺乏羣衆觀點的態度，不但在執行政策上是如此，對於各種組織形式與工作制

度的採用與實施上，也是一樣。我們已建立或要建立的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都是爲了廣大羣衆的利
益與對敵鬥爭之所需，那麼，假若現有的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廣大羣衆的實際生活中，已成爲一種
「盲腸」，或者某種尚未建立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羣衆看來已經成爲必要時，前者如鄉村及連隊中
某些煩雜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後者如戰鬥英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會議，擁政愛民與擁軍制度等，
我們就應當根據着廣大羣衆實際生活的需要，大膽的向上級建議取消或建立，或者就直接了當的把它取消
或建立，才是對的。但是過去我們多半沒有這樣做。有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廣大羣衆看來已經沒有
意義，我們的幹部常常藉口於這是上級的指示與規定，不敢稍有變更。同時，某些東西，在羣衆的實際生
活中已成爲像空氣一樣的需要，我們卻又藉口因上級沒有決定與指示，也不敢建議，或自動的增設。這些
都是缺乏真正羣衆觀點的表現，只要有真正的羣衆觀點，就不會採取此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自然這種從
真正羣衆觀點出發的負責態度，決不能被那些黨性不純的幹部作爲不服從組織領導、對黨鬧獨立性的藉口
。一九四二年冬與一九四四年春，西北局的兩次高幹會議，對於許多會議制度與組織形式，例如軍隊中的
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詳見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已經這樣做了。他們這種革命的
而不是保守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那裏，羣衆中有幾個相當普遍而值得我們注意的說話
，一種是：「二黃那裏稅多，頑固那裏罪多，新四軍那裏會多！」又一種是：「新四軍什麼都好，就是開
會太多不好！」再一種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人來講話！」我認爲這是對於我們在開會與講話問
題上，缺乏羣衆觀點的主觀主義的同志們一種辛辣的諷刺，然而我們有很多幹部，並沒有從這種諷刺（羣
衆的正確呼聲）去得到應有的教訓。對於這種呼聲，充耳不聞，能够算是有羣衆觀點嗎？

「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一正確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不僅在制定鬥爭綱領時要
這樣做，不然，你所製定的鬥爭綱領，就是「無的放矢」；而且在選擇工作方式時，也要這樣做，否則你
所選擇的工作方式，也是「張冠李戴」，保管會要碰釘子的。我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常常是信心十足
的乘興而往，垂頭喪氣的敗興而歸，有許多就是這個緣故！

「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秧歌」、「教育合作社」、「衛生合作社」等，是今天
在陝北的生產、文化、衛生運動中最高爲廣大羣衆所瞭解歡迎、能够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陝北的黨
就運用這種方式方法有效的達到組織勞動、發展生產、豐衣足食、普及文化的偉大目的。這種經驗，是值

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續之，我們應當根據着廣大羣衆的鬥爭經驗，覺悟程度，歷史傳統，文化水平，生活習慣等等具體情況，去製定我們的鬥爭綱領（工作要求與工作決定等）與選擇我們的組織形式及工作方法，絕不能單憑在我們自己腦子裏所想出來的鬥爭綱領與鬥爭方法，拿到羣衆頭上去硬套，或者拿了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作爲我們測量廣大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積極性的尺度。這就好像我們應當照着腳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腳是一樣的道理。

六 我的聲明與希望

上面我所寫的這幾個問題，是我個人在黨校幾個月學習當中，對於過去工作的一點初步反省。而這種毛病，我看是我們幾個人中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在此，我要順便聲明一下的，就是：我在上述幾個問題的反省中，幾乎都是講的錯誤與缺點，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就沒有提。但這絕不是說，我們幾年來的艱苦鬥爭與各項工作，沒有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的正確的好的東西是很多的，我們是執行了中央與華中局的正確路線，並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中，我們就根本不能在那裏堅持鬥爭與開展工作，更說不到還會有很大的發展了。並且我的意思，也不是故意光說壞的，使我們自己洩氣，我之所以這樣，是由於我認為，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中確實存在着缺點，我們還沒有想通領導方法上的全般問題。就拿我們所有正確的好的東西來說，許多也還是處於一種摸索階段，許多東西，還並沒有被我們系統化、條理化，並沒有發展到高度自覺的階段，這就是由於思想領導上的薄弱。而這種思想領導上的薄弱，正是我們在領導工作上的最主要缺點。這也就是我們在整風學習當中，對於學而不思其門面做，不大感覺興趣的主要原因。不知你們以為然否？

最近的國際形勢，對於我們，真是空前有利。近幾個月中的淮北抗日鬥爭，也是最近幾年來沒有過的開展，今後的形勢，有可能更好，我們的各種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開展。但是，在此，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幾年的抗日戰爭中，我們也吃過許多大虧，而又都是在我們獲得很大勝利與發展之後吃的。這種例子，可以舉出好些個。總之，在抗日戰爭中，在一個比較大的勝利與發展之後就要受一次損失，這幾乎成了一種規律。同時，有不少的進步人士與中間人士，在我們困難時，曾經靠近並幫助過我們，在我們

的勝利。我們不怕困難的。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怕指出自己的缺點，因為我們對於我們失敗者成功之母，我們是決不怕困難的。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怕指出自己的缺點，因為我們對於我們事業的正義性，是認識得很清楚的，我們是有完全的勝利信心的。我們的總路綫是正確的，我們的成績又是很大的。只要我們能認真反省缺點，認真打通思想，提高自覺性，去掉盲目性，我們就會大進一步。我寫這封信，主要的是作為自己反省，寫給你們看看，同時也希望你們考慮一下。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變為引玉之磚。寫得太多了，不再寫下去。

劉子久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蘇聯社延安七月廿八日電）

關於工作作風問題

高崗

按此文乃高崗同志在一月九日西北局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五年邊區的主要任務和作風問題」的第二部份。第一部份因和高崗同志在羣英會上講話大體相同故略。

——新華社編者

關於工作作風問題，這是當前主要問題，是我今天要講的中心問題。

首先應該估計一下我們黨的路綫和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在執行中間，在某些問題上還有某種缺點和錯誤。比如：合作社攤派股金，羣衆不贊成硬要攤派，這就是主觀主義作風的表現，就是錯誤的。我們許多同志承認自己有主觀主義，但是主觀主義的具體表現如何，性質如何，程度如何，我們應當衡量一下。我們作的事情是人民贊成的、合乎大衆利益的，所以是正確的。人民擁護我們這是事實。但是也有一些事情人民不滿意，這也是事實。爲什麼人民還有不滿，爲什麼我們費了很大力量想替人民謀利益而羣衆反有不贊成的地方呢？這就值得我們反省了。我們不能自滿，不要以爲我們的工作已經做得不錯就寬容自己，而應該不斷努力，隨時改正自己的缺點。

區鄉幹部一般的說都很有努力，很負責任，但還有不少叫苦的。叫苦有兩種：一種是沒辦法，「解不下」；一種是事情多，忙得很，一件事未完另一件又來了。這個責任主要由誰來負呢？應當由上級來負。我是西北局負責人，應當首先由我負。下級「解不下」應當幫他「解下」，這是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的責任。但是目前的情況是迫使他們失去了工作的主動性，這表現在：（一）任務多，使區鄉幹部對整個工作抓不住中心。例如：上面頭腦多，部門多，一下子發下去許多指示、表格，就使下面無從做起。要知道下邊的幹部和老百姓識字的很少，白天忙於生產，晚上還要睡覺，如果任務多了，他們除了隨便敷衍付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二）會議多。比如：去年邊區開了很多會，一般的說，這些會議都開得不錯，各有各的作

用，但也有機會發覺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應如何解決？應如何解決？應如何解決？

家的準備還不太深刻，以致效果不大。(三)調查、研究少。我們應當怎樣調查？派一批人下去專門作調查是一種方法；各級幹部平時在每一件工作上都在調查，把本縣、本區、本鄉的經濟、政治、文化、幹部的情况和羣衆的情緒等材料經常積累起來，這又是一種方法。如果縣長、縣委書記、區長、區委書記平時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種問題：農村中怎樣增加糧食，發展紡織，怎樣養牛、養羊，怎樣植棉、植樹，幹部情況怎樣，羣衆有什麼滿意和不滿意的地方，過一個時期大家談談一下，改進自己的工作，這樣就會很有幫助；如果只靠上邊派工作團、調查下去，不是直接担負工作的同志在實際工作中調查研究，並不實際參加解決問題，結果會使上邊下去調查的人很苦，下邊的人則感覺對他們沒有幫助或很少幫助，甚至反而增加麻煩，也不滿意。當然這不是說調查團、研究室沒有作用，不過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應當以担負實際工作的同志從日常工作中日積月累的調查研究為主，才更有補益。(四)跑腿多，用腦少。上邊給的任務多，缺乏中心，接到一件又一件，有什麼事就跑一跑，完全失去了主動性。這就是四多四少：任務多、開會多、調查多、跑腿多，主動少、檢查少、研究少、用腦少，這中間最主要的是主動少、用腦少。這個問題責任主要是上級的，但下邊是否也有責任呢？不講清楚一條也不對，這叫偏向。假如上邊有指示在我這裏行不通，就應當申辯。如果上級指示行不通，一不申辯，二不打招呼，採取應付態度是不對的。上級的指示，除對個別問題的具體指示外，只能照顧一般的、主要的情況，不可能照顧到所有各地的具體情況。因此接到上級的指示時，必須根據本地情況佈置工作。黨的政策要拿到羣衆中間去實現，假如行不通那就好，行不通就要改正，開始行通以後又行不通也要適當改正。毛主席說：「我們要堅持真理，隨時準備改正與修改自己不正確的意見，不適合情況的言論、行動，政策要隨時準備修改。」這就是這個道理。

上級指示要慎重，要估計到當時的具體條件，羣衆的需要以及各地的經驗。最好先醞釀商量，並仔細研究一下再發出去就少出亂子。另一方面下級服從上級是應該的，但服從組織不是盲目的服從，相反切指示都是給羣衆辦事，其中可能發生毛病，有毛病就應當提出來，提出問題並不等於不服從組織，黨的一這才是自覺的服從組織。我們對誰負責？為誰服務？如果這個指示對羣衆沒有利益，就應當立刻改正，或者指示難行，羣衆還不停悟也要等待一下，這是正確的。等待羣衆的覺悟，而不是「等待主義」的「等待」。

在這種情況下，給上邊打一個招呼是對黨負責，不是鬧獨立性。